

2. 苏联人类学四十年

(苏) L·Φ·杰别茨

苏联从沙皇俄国接收了两个主要的人类学研究中心：一是莫斯科的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ΠΟΕΑΘ），一是彼得格勒的俄国人类学协会。

通过苏维埃政权初期对科学工作进行的组织改造，研究所占了中心的地位。

1919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了教研室，并于1922年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领导研究所、博物馆和教研室的是Д·Н·阿努钦，在他死后，1923年，В·В·布纳克接替了他的工作。从此至今，莫斯科大学互相关联的人类学研究所、博物馆和教研室，是苏联最大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同研究所平行地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不起主导作用，如同今天取代它的莫斯科自然界试验者协会人类学部一样。

苏联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三十年代初以前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到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以前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一直到今天。

苏联人类学发展的主要阶段

苏联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特点，首先是研究工作在数量上扩大了。国家预算成为科学工作财政拨款的主要来源。这个来源同革命前科学协会和个别热心者微不足道的，主要是偶尔的一点资金相比，不知强大多少倍。特别重要的是，人类学研究开始由人类学专家进行，对他们说来，科学

已不是闲情逸致，而是基本职业。

新的形势在资料的积极积累方面立即产生了效果。早在1921年，莫斯科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在B·B·布纳克领导下，就组织了对伏尔加中游各族，即马里人和莫尔多夫人的研究。在以后十年之内，材料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革命以前的年代所收集的偶尔而残缺不全的资料。伏尔加中游的工作，主要是在Л·И·津克维奇的领导下继续和扩展起来的；Д·А·佐洛塔廖夫组织了西北部各州的系统研究；Д·В·澳沙宁·А·У·亚尔霍、В·И·列文С·И·鲁坚科分别着手进行了中亚细亚、阿尔泰萨彦岭高原、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研究工作。

从M·A·格列米亚茨基（1922）发表波德库姆头盖骨的记述以来，古生人类的研究就列入了俄罗斯人类学家直接研究的范围。

在人类形态学领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伊尔库茨克的一个解剖学家集体，在H·П·布什马金领导下，在布里雅特人的体质类型研究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Д·П·尼科拉耶夫在哈尔科夫组织了一个研究乌克兰居民的人类学家小组，出版了大批出版物。在B·B·布纳克总的领导下，对俄罗斯联邦中部各州各种职业工人的体质类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Я·B·鲁巴什金和B·П·维什涅夫斯基分别在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领导了从事苏联各族血型研究的一个巨大的医生集体的工作。

当时，发表已经收集的材料的出版能力明显不足，因而相当多的资料无法出版。尽管如此，1922年重新发行的《俄罗斯人类学杂志》，在B·B·布纳克主编下，仍然反映了当时苏联人类科学的基本成就；这个杂志一直发行到1930年。

同时，还出版了几种专著和文集。

固然，当时苏联人类学取得的成就是重要的，但它在理论基础方面同革命前的俄国人类学却区别不大，尽管这些理论基础，应当说，不是反动的。而且，它们无疑是进步的。俄国人类学的绝大多数活动家是达尔文主义者。在革命以前很久，种族主义在《俄罗斯人类学杂志》上就受到了谴责（西尼茨基，1907）。可是，不论是革命以前的时期，还是苏维埃时期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人类学家明显不足的是使苏维埃科学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主要的东西，这就是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伟大的转折年代”反映在苏维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能不对苏联人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1930年，莫斯科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由一个对外不开放的文物储藏室，变成了一个主要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独立的事业单位。M·C·普利谢茨基开始领导博物馆的工作，他的名字同发展苏维埃（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实质上）人类学的活动是紧密相联的。宣传人类起源学说中的达尔文主义，宣传族体人类学中的人类种族平等，是博物馆的根本任务。除宣传积极的知识外，同妨碍认识真理的学说，即同人类起源方面的造化论和族体人类学中的种族主义进行斗争，也是博物馆成立之初即为自己提出的一个目的。

在同一个1930年，于基辅召开了第四次动物学家、解剖学家和组织学家代表大会，大会设有人类学小组。在小组工作过程中，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所规定的人类学基本任务至今仍然有效。当时，也确定这门科学分为三个部门：形态学、人种学和人类起源学。

形态学的基本任务是要有助于保健方面和日用品首先是

服装标准化方面的活动；人种学（族体人类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各族的历史和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人类起源学的基本任务是依据恩格斯的人类起源于劳动的理论来研究世界观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932年，开始发行《人类学杂志》，M·C·普利谢茨基同样被任命为主编。杂志的头一期就清楚地表明，这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类学机关刊物。

1933年，莫斯科大学恢复了1931年暂时中止其存在的人类学教研室。M·A·格列米亚茨基教授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除培养人类学专家外。在教研室面前还提出了在生物系讲授人类解剖学的任务。在这以前，生物系学生假如也听了人类解剖学课程，但那只是医学系缩减了的（而决不是改善了的）课程。M·A·格列米亚茨基在人类学教研室制定了以比较解剖学观点为基础的新的解剖学大纲，其目的在于使人类解剖学的讲授接近这个系的一般专业。后来（1950），M·A·格列米亚茨基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发表了一部人类解剖学教科书，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由于意识到人类学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它在苏联人民科学和文化总体系中的作用，人们就提出了不止一次在《人类学杂志》上阐述过的一般理论问题（布纳克，1934；格列米亚茨基，1934；亚尔霍，1932、1934；特罗菲莫娃和切鲍克萨罗夫，1933；伊格纳季耶夫，1937；罗金斯基，1937，等）。问题的提出没有导致，当然也不可能马上得到彻底解决。许多问题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三十年代发表的许多东西看来是错误的，但引起人们对学科基本问题的重视这个事实本身，对于学科的提高不能不起促进的作用。实际材料的积累化在这些年代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在进行，

而且主要的是更有系统和更有目的地在进行。

苏联人类学家在国内研究方面的活动，博得了国外的高度评价。1939年，美国人类学家K.C.库恩写道：“我认为，我们，其他国家的人类测量学家，在我们莫斯科同行面前应当脱帽，对他们研究的规模和质量表示敬意”（库恩，1939，649页）。

然而，在引起苏联广大公正的重视方面，苏联人类学家的努力还是不够的。1937年，《人类学杂志》的出版中断了。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使人类学研究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苏联人类学家在战场上和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蒙受了一系列严重损失。

但是，从1943年开始，当时战争进程并不显示出决定的转折，科研机关的生活开始在紧张地恢复。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建立人类学研究室，是苏联人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研究所所长С.П.托尔斯托夫的建议成立的这个研究室，立即开展了苏联族体人类学方面的巨大工作。填补了苏联地图，主要是东部边区地图上的许多空白点。在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下，许多加盟共和国建立了人类学试验室，为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爱沙尼亚、塔吉克就是如此。拉脱维亚人类学试验室目前正在组建。系统研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的考察队，已工作了多年。在B.B.布纳克的创议和领导下，恢复了俄罗斯人民人类学的系统研究。民族学研究所发表了有关族体人类学和人类起源学问题的几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

人类学家成了族源方面全部综合性工作的必须参加者。考古学家对人类学材料兴趣的增强，古人类学材料积极地积

累起来了。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H.N.伊利延科^①和M.M.格拉西莫夫试验室制定的古颅骨胶合和复原技术,使人们可以用来对成百个古颅骨进行科学研究,这些颅骨由于保存不完整,过去都被学者们留在原地了。不错,这种做法现在也没有彻底排除,常常有考古学家把人的骨骼留在坟墓里的情况,但这方面的成就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中,建立了牢固而卓有成效的联系。这里必须指出的有:B.B.金兹堡同A.H.伯恩斯坦和C.C.切尔尼科夫合作进行的极其紧张的活动(1949,1950,1954,1956),T.A.特罗菲莫娃(1957)参加花拉子模考察队考古学家的工作,T.C.康杜克托罗娃(1956,1956a)对乌克兰考古学家获得的广泛的古人类学材料进行的系统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工作。

在考古学博物馆的展品和考古学家的著作中,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M.M.格拉西莫夫及其实验室工作人员所完成的古代各族外貌的复原。M.M.格拉西莫夫的著作(1955),除其他价值外,也是我国古代各族代表形象的示意图。

到1957年,苏联领土内的基本种族特征研究,可以认为已经基本完成。综合已有的资料,编制特别分布图,等等,已提上日程。

将近十年前出版的苏联古人类学资料综合报告(杰别茨,1948),几乎各个部分今天都已过时。穆斯特埃时代(罗金斯基,1954年)、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杰别茨,1955,1955a)的新发现已经找到和记述下来。发表了贝加尔沿岸新石器时代的新材料(列文,1956),重新研究了阿尔泰

^① 这个工作战前由E.B.日罗夫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已经开始。

学,以及具有明显的遗传性的其他某些特征的研究。主要的缺点在于削弱了人类学特征的形态学研究方面的工作。遗憾的是,人类学同各历史学科的联系,伴随着人类学同生物学的某些脱节,从而有变人类学研究为手工业式的“颅骨测量”的威胁。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应当研究作为人类学基础的形态学问题,可是它处在科学院系统之外,因而使组织工作和发表著作的物质能力十分不足。形成了一种离奇的、极不正常的状况,这就是:人类学研究所近十年出版产品的规模,比民族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出版物的规模要小许多倍。

人类学工作的技术装备,遗憾的是,仍然希望有许多好的东西。不能说,苏联人类学家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工作。三十年代初,A. u. 亚尔霍(1922)制定了确定面部软体部分形态学特点的标准。B. B. 布纳克依据色度学材料,制定了确定皮肤和头发色素沉着的等距曲线表。籍助于这些表所收集的材料,比以卢尚和菲舍尔表为基础收集的材料,对于统计加工要便利得多。C. N. 乌斯生斯基(1954)设计了测量颅骨容量的仪器,其特点是测量相当准确。Φ. M. 阿乌利发明了极其方便和轻便的肺量测定器。可是,这一切仪器、表格、模型和工具的批量生产,大部分未能实现,因而工作效率大大地降低了。

所以,苏联人类学家在迎接我国存在四十周年的时候,不仅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取得的那些成就,而且按照苏联人已经形成的传统,也意识到自己工作中的困难,并力图尽快予以克服。

明确认识这些不足,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克服这些不足,使人类学各部门将在和谐结合中得到发展,这是科学卓有成效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类起源问题

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结合灵长目动物学和古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工作进行的。系统发育学的第三方面，即胚胎学研究，在苏联人类学家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灵长动物的研究，形式上属于动物学领域，实际上和实质上是人类学家活动的范围。苏联的灵长动物研究，主要以1927年建立的苏呼米猿猴繁殖场为基地进行的。尽管这个繁殖场包括在医学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它经常为人类学家用来进行科学工作和培养干部。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每年来苏呼米繁殖场进行夏季实习，这种实习通常是在人类学家-灵长动物学家М.Ф.涅斯图赫的领导下进行（1936，1946）。

灵长动物的解剖工作，主要由М.А.格列米亚茨基（1933）及其学生（科切特科娃，1953；赫里桑福娃，1956，等）进行。在灵长动物学的理论工作中，应当指出М.А.格列米亚茨基有关旧大陆和新大陆猿猴在系统发育学和分类学上统一问题的研究。大家知道，有些研究者根据古地理学材料认为，宽鼻猿直接来源于始新世的眼镜猴，它们同窄鼻猿类似是因为发展的平行现象，因而把美洲猿列为一个特殊单，是没有系统发育学根据的。依据М.А.格列米亚茨基的意见，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不应当从残缺不全的古生物学材料、古地理学假说出发，而应当从比较解剖学更为可靠和更加丰富的材料出发。上述作者认为，这些材料证明，一切猿猴都来源于一个具有一切猿猴所共有的某些特征的共同祖先，必须从这条原理出发来考察古生物学材料。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北美和欧洲的古第三纪眼镜猴不是猿猴的祖先，早在第三纪初就应当存在过以前不同于灵长动物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猿猴的共同祖先。

苏联人类学家所进行的古人类生物学研究工作的基础是，苏联领土上发现的人类遗存和对国外研究者资料的加工。

Г. А. 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的两卷本专著（1941，1954），描述了1924年在克里木基伊克-科巴山洞发现的人类遗存，其中第二卷是由B. B. 布纳克在作者死后编辑出版的。编者在著作中加了注解，补充了一篇专门论文，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类在灵长目动物中的系统发育地位的有趣的，尽管是有争议的思想。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1938年在乌兹别克捷希克-塔什山洞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小孩骨骼，在一部集体长著中作了描述，这部著作中的一篇主要的人类学论文是M. A. 格列米亚茨基（1949）撰写的。捷希克-塔什的发现是Ф. 魏登雷希和本文作者（杰别茨，1947）争论的对象。在魏登雷希看来，捷希克-塔什颅骨应属于巴勒斯坦型“进步的尼安德特人”。B. B. 布纳克（1951）在脑腔模塑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本文作者持有另一种立场，认为捷希克-塔什小孩接近萨佩莱型尼安德特人，但是，近来（杰别茨，1956）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之后，不得不承认Ф. 魏登雷希和B. B. 布纳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三个穆斯特埃时代的古人类发现，是由A. A 福尔莫佐夫1953年在克里木斯塔罗谢利耶村落附近山洞中发现的，Я. Я. 罗金斯基作了描述（1954）。原来，斯塔罗谢利耶人虽是穆斯特埃年龄，但他属于智人类（Homo Sapiens）。假如注意到斯塔罗谢利耶人的个体发育年龄极小（一岁半到两岁），这个结论就会带有一点可疑的性质。可是，后来（福尔莫佐夫，1957）在清理动物化石材料时，在同一个村落遗址上也发现了成年人的断骨，其中有片断下颌骨，它的

下颚突起是如此明显，以致对属于智人类这一点无可怀疑。

苏联对人类起源学说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类（或人科）的起源，一是现代人类（Homo Sapiens，智人）的起源。

在近年来（1952—1957）展开的讨论过程中，区分这两个问题显得特别迫切。在有关一般人类起源问题的著作中，Я·Я·罗金斯基（1951）和В·П·亚基莫夫（1951）详尽地阐述了人类生物史的两个阶段概念。第一阶段包括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直到Homo Sapiens（智人）的形式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上，人类生物本质的变化过程通过适应劳动活动和社会生活仍然在继续，“现存人”、智人的出现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这种观点，在人科分类观点和原始社会史分期的尝试中都有反映，其中直立猿人和尼安德特人时期被划分为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概念受到来自各种不同立场的批评。А·Я·布柳索夫（1953）对于划分“形成中人”特殊阶段的思想本身，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人类学家确定的人类性质类型发展阶段与社会历史无关。Б·Ф·波尔什涅夫（1955）占有另一个极端的立场，他不仅承认直立猿人和尼安德特人同智人类人区别的重要性，而且建议只有从Homo Sapiens（智人）形成起才算人类历史，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不是人类劳动的工具，而是动物（本能）劳动的工具，这些工具的创造还不是人。两种极端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人类学材料注意不够。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叙述Я·Я·罗金斯基（1956）和Ю·у·谢苗诺夫（1956）文章中对А·Я·布柳索娃和Б·Ф·波尔什涅夫的观点所作的分析，只指出一点，就是：А·Я·布柳索夫没有考虑到导致智人形成的因素的重要性，而Б·Ф·波

尔什涅夫则没估计导致人科形成的因素的重要性。换言之，两种概念的作者都把人类体质类型的进化同社会历史割裂开来了。两位作者在劳动活动史之外，在社会历史之外，来考察人类学研究所确定的这些或那些事实。同时，人类历史在各个方面都不排除人类体质类型史，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进程决定的。人类体质类型的变化不能不具有社会历史基础。因此，必须集中注意上述两个问题：人类起源和智人起源的问题。

在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问题中，关于人化的生物学前提和关于远古劳动活动的性质这两个基本问题，引起了苏联研究者的重视。

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导因素，当然，它不能在任何一种动物中产生。人类特有的一切结构特点，为大脑、直立行走、手的结构，都是在劳动活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在人科祖先当中就应该有了发展的前提。

在涉及人类直接祖先问题的著作中，要提出М·Ф·涅斯图尔赫（1954）的批判性著作和Ю·Н·谢苗诺夫（1956）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后一著作的中心点是讨论Б·Ф·波尔什涅夫提出的“本能”劳动，即前人类劳动（人类以前的劳动——译者）的问题。Ю·Н·谢苗诺夫在他恰当地称为前人（人类以前的人——译者）的南猿中，找到了这个劳动发展阶段。

苏联学者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发现，为研究者提供了对于阐明从猿到人的生物学前提有着决定性科学意义的事实。从这些发现中，应当特别指出Н·Ю·沃伊托尼斯的著作（1936，1949）。阐明猿的“好奇心”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沃伊托尼斯看来，考察冲动产生于食欲冲

动，但超过食欲冲动而变为独立的冲动。问题在于，只有寻找各种食物，猿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营养。考察每个客体（果实、胡桃、活的软体动物的外壳、植物嫩芽及其食用果仁等）愈积极，找到新的食物来源的机会就愈多。因此，食物冲动产生了操作欲望，而这种欲望则是制造工具的重要前提之一。

Г.А.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研究基伊克—科巴山洞古生人手的著作（1941），也很重要。把这个手的构造同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的手加以对照，Г.А.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发现，基伊克—科巴人决不处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地位。根据这一点，Г.А.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试图推翻人的祖先曾经度过栖息生活这个早已形成的观念，但并未奏效。然而，他的著作的意义在于，“栖息阶段”不得不由从猿到人时刻起上推一段时期。人的祖先在从动物状态过渡到人的状态以前，早已能向地面生活。现在，在东非中新世地层发现称之为普罗康苏尔的古生猿遗存之后，有关人祖地面生活方式的意义得到新的证实。Г.А.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的观察，对于说明一个现在已十分明显的结论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是类人猿，它过的不是栖息生活，而是地面生活了。

人祖对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人化的生物学前提。自从人类出现有意识的劳动活动以来，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和人类体质类型的发展中，虽然起着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人类以前的阶段，则是另一码事。有机界的全部发展过程同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适应地理环境是自然选择的重要途径之一。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起源过程的意义问题，在三十

年代的苏联书刊中展开了特别活跃的讨论。这个问题同远古
人劳动活动的性质问题密切相关。作者们稍许将问题加以公
式化，这样提出了两个问题：

1、地理环境的变化（通常说的是寒冷及随之而来的现
象）是不是人化的必要条件？

2、猛兽生存方式，即非现代猿固有的谋取食物方式，
是不是人化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过去和现代都是极其分歧的。

按照П. П.叶菲缅科(1936)和A. M.佐洛塔廖夫(1936)
的意见，不论是环境的变化还是狩猎，都不是人化的必要条
件。

B. K.尼科利斯基(1936)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必要
条件。而狩猎和肉食，在他看来，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

П. Ч.鲍里斯科夫斯基(1935)则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
依据他的意见，不过渡到狩猎生活方式和肉食，人类从动物
界分化出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过渡同地理环境的冷寒
或其他变化没有因果联系。

C. П.托尔斯托夫(1931)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
答，按照他的意见，肉食需求首先引起了工具的使用，然后
是工具的制造。而对肉食作为一种基本食物的需求，本身又
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热带及其
植物食物的广泛资源缩小了。

C. П.托尔斯托夫的观点，是最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的。

人类起源的第二大问题，是现代人类（智人）起源的问
题，它比人科起源问题引起的重视不是更小，而是更大。

问题首先说的是尼安德特人〔广义上，即包括岸唐（印
尼）、布罗肯希尔（赞比亚）、萨尔达尼亚（西班牙）等地

的发现〕和现代人在起源上的相互关系问题。

大家知道，十九世纪古生人的发现引起争论的，主要是它们的可靠性问题。古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认为，关于古生人颅骨的特点是在病理学过程、死后变形等影响下形成的意见只有历史的意义。古生人的种类不是人类的发展阶段，而是进化“旁支”，这种观点日益广泛地流行。Homo sapiens（智人）及其全部特征，至少是基本特征的存在，在这种观点看来，是从无法确定的远古时代开始的。

皮尔特道纳的发现是这种理论的标志。人们至多认为，发现上注明的日期是不够好的。看来，只有B. K. 尼科利斯基（1931）才毫不含糊地称它为“伪造”。苏联其他研究所不想这样坚决地表示态度，但从三十年代起，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认真看待皮尔特道纳的发现。现在，当B. K. 尼科利斯基原来是正确的，发现确实是地道的伪造时，Homo sapiens（智人）独立发展道路理论就丧失了自己的根本论据。但是，在苏联人类学书刊中，早在皮尔特道纳的发现被揭穿以前就尖锐地反对过这种理论。这里，如同在人类起源的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Я. Я. 罗金斯基（1947, 1951）作出了主要的贡献。他认为，斯凡斯科姆布和方捷舍瓦德的两个发现的，仍然是“前智人”存在理论拥护者的武器，但从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特征来说却接近尼安德特人。Я. Я. 罗. 金斯基指出另一情况也并非不重要，他认为，即使尼安德特人当中存在眼眶上的隆凸不够发展如同其他“智人”特征一样的个别个体，也不能驳倒人类发展中存在尼安德特人阶段的理论。

在尼安德特人的个别个体（或群体）当中，进步特征的出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从“阶段论”观点看来甚至是必要的，否则，尼安德特人和智人之间起源继承性的产生完全是

不可想象的。

在承认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类祖先之后，我们就应该回答这种新人产生的原因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每一个阶段论拥护者的面前。

众所周知，苏联人类学家不是这个理论的唯一拥护者。国外的许多研究者过去和现在都赞同这个理论。Ф.魏登雷希（Weidenreich, 1928, 1943）是这种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大家知道，这个研究者没有看到需要在某些外部因素中去探索现代人形成的原因。这里停止在论证反对自身发展论的意见上未必是恰当的。

A. 格尔德利奇卡（Hrdlička, 1927）是人类起原阶段论的首批拥护者之一。他认为，冰河时期生存竞争的严重条件是现代形成的原因。可是，现代人的特征与其生活条件的联系，在格尔德利奇的著作中并没有揭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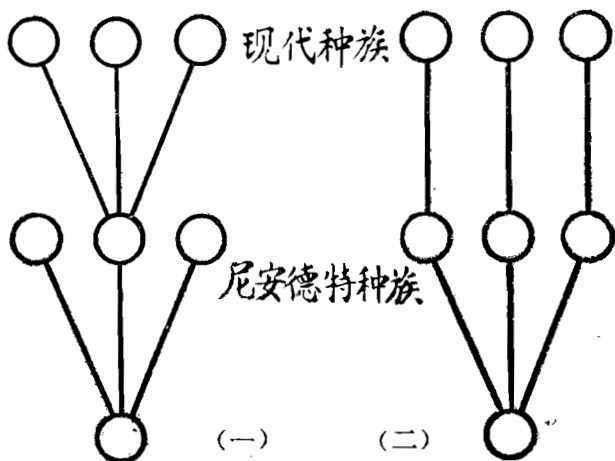
苏联研究者或者是从可能扩大引起各种特征组合的可能性扩大的外婚制的产生（叶菲缅科，1934）中，或者是从适应劳动活动复杂化过程所必需的更完善的运动（邦奇—奥斯莫济夫斯基，1941）中探索了Homo Sapiens（智人）形成的原因。

所有这一切因素却不能不加以重视，但在П.П.叶菲缅科的著作中，如同尔德利奇卡一样，具体特征同生活条件联系的实质并未揭示出来，而Г.А.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只谈身体尤其是手的结构，但区别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正在于颅骨结构之中，这些却并没有加以考察。比较有根据地解决现代人起源因素问题的是Я.Я.罗金斯基（1935，1951）。他的观点的实质是，现代人大脑的前额部分比较发达，因而证明动物本能的皮层制动的发展水平比较高，这是

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正是这一点为现代人提供了尼安德特人所没有的决定性优势条件。

假如人类发展的尼安德特阶段问题在苏联人类学家中没有引起重大分歧，那么现代人类种族同尼安德特种族的起源联系则成了争论的对象。尼安德特人存在种族差异的事实本身是没有疑问的。不错，这个事实难于为直接观察所证实，这首先是因为材料不够。可是，尼安德特人散居在整个旧大陆的土地上，存在了不是几十万年，也有几万年的时间，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准确无误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和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不能不形成种族上的差异。

但是，尼安德特种族是不是现代种族的始祖呢？Я. Я. 罗金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苏联人类学家多数都同意他的这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在尼安德特种族和现代种族之间存在起源继承性。这些理论中的第一种理论（如上所述，这是占优势的理论）以单一中心论著称，第二种理论则称为多中心论。这个理论可以图示如下：



现代种族尼安德特种族（一）（二）

关于现代人类种族起原的：（一）单一中心论；（二）多中心论

单一中心论的论据，可以扼要归结如下：尼安德特人各种族之间的形态学差异同现代人各种族的差异并不一致。就某些特征来说，世界各地尼安德特人互相间的差异，要大于现代各种族的差异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早期形式相互间的差异，要小于今天活着的智人代表的差异。

智人在某块土地上一经形成，在生存斗争中就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必然很快传遍人类居住地，不可避免地会排斥周围的尼安德特种族。

为了替多中心论辩护，人们提出了欧洲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种、中国猿人和蒙古人种具体一定的共同特征的意见。的确，现代尼格罗人种没有保留与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尼安德特人相似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罗德兹人的颅骨同爪哇岸唐人颅骨相似，因而现代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古代部分的特点是，同处于尼安德特发展阶段的人类体质类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中止自然选择的形成作用，是智人的根本特质之一。然而，在自然选择对假设的“不再分化的Homo Sapiens(智人)”产生的影响之外来设想种族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根据单一中心论，这种智人是存在的。

人种学问题

人种起源的单一中心论和多中心论问题，是人类起源问题向人种学问题的过渡。

在这个人类学部门中，苏联研究者最注意的是确定种族

和人类学类型亲疏关系的方法和将人类学材料作为历史资料加以利用的方法。

人类学分类是确定人类学类型亲疏关系问题的外部表现。

在这方面，А.И.亚尔霍的著作（1932，1933，1934，1947）起了最大的作用。贯穿他著作的一根红线是，种族范畴和种族特征在分类学上不具有同等价值的原则。当然，不能说А.И.亚尔霍第一次确定了这个原则。在十九世纪的多数人类学家当中，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曾经出现过。А.И.亚尔霍的功绩，是引起人们对这个原则的重视，把这当作种族分析的基本前提。

自觉对待分类价值不等原则，在二十年代无疑已经存在。

对分类价值不等原则实际重视不够，使人们对人类学工作大纲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在这方面，二十年代列宁格勒人类学家的著作是特别说明问题的，其中除仔细考察第二位或者甚至第三位的特征外，没有注意阐明被研究集团在大的种族体系中的地位的基本特征，因而也没有重视它们起源的主要问题（鲁坚科，1927；佐洛塔廖夫，1928，1930；捷列宾斯卡娃—申格尔，1928）。

А.И.亚尔霍制定的种族分类原则，在苏联人类学家有关苏联及其邻国广大地区居民的种族成分的一系列综合性著作中，得到了运用。

А.И.亚尔霍关于阿尔泰—萨彦岭高原突厥语系各族的著作，只是作者不适时的死亡十二年之后才发表的。尽管如此，这部著作还是手稿时就开始颇为驰名，成了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如同他有关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族的其他著作（亚尔霍，1932，1933）一样。

这些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有：Л. В. 奥沙宁和В. Я. 泽津科娃的中亚细亚综合报告（1953）；Н. Н. 切鲍克萨罗夫有关东亚（1947）、俄罗斯平原东北部（1946）和波罗的海（1954）各族的著作；Т. А. 特罗菲莫娃（1947, 1949）关于伏尔加和西伯利亚鞑靼人的著作；М. Г. 列文正在印刷中的有关苏联远东各族的大型著作（在这之前，同一作者发表过一些单独的文章，列文，1947, 1949），以及许多其他著作（阿列克谢耶夫，1956；杰别茨，1947, 1951；佐洛塔廖娃，1956；米克拉舍夫斯亚，1956；纳季什维利和阿布杜舍利什维利，1955）。

人类学材料作为历史资料的作用问题，是苏联人类学经常注意的中心。二十年代初，В. В. 布纳克的论文（1924, 1924a）就阐述过这个问题，这些文章在作者后来的著作（布纳克，1932, 1932a）中得到了继续发展。这些著作的基本原理是确定了苏联芬兰语各族人类学类型的混合性质。这个结论同过去研究者的著作比较，无疑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为过去的著作把“芬兰因素”看作某种同类的东西，并与“斯拉夫因素”对立起来。В. В. 布纳克著作奠定了现代关于芬兰语各族人类学成分概念的基础，这些著作的主要意义也就在这里，尽管作者未能摆脱把他划分的人类学类型与现代语族等同起来的趋向。这种趋向曾经受到尖锐的批评。语言联合为这种或那种语族的各族人类学成分，不仅现在（这早已是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常识），而且在这些语族形成过程中，都具有人类学上不同种类的特点。上述批评就是从这条原理出发的。这个原理同Н. Я. 马尔学说紧密相关的，按照这个学说，语族的形成是相距遥远的各种语言互相接近的过程。由于1950年的讨论，这种语族形成观点，大家知道，已为多数苏联语

言学家所驳倒。亲属语言起源于一个原始语①的概念重新占了上风。

关于各族是各种“基础语言”的代表 的原理，重新成为研究各族起源问题的基础。

如果这条原理是正确的，那么提出“原始芬兰人”、“原始斯拉夫人”和其他的“原始族”的人类学类型问题也完全是正当的。苏联人类学家并不打算来解决这一切问题，但现在看到了同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的道路，其根据是，依据人类学材料确定的任何迁徙、种族的任何混合，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也一定能够在各种语言的分布和相互作用中找到这种或那种反映（杰别茨、列文、特罗菲莫娃，1952）。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一切有助于族体起源研究的人类学著作，仅仅举几个例子：

1.在东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居住着说通古斯—满语系（通古斯人）和突厥语系（雅库特人）各种语言的各族。这些语言分布在他们不久以前，即几百年以前所占据的土地上（通古斯语无疑早于雅库特语）。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些语言的传播同人们的迁徙有多大的关系。人类学材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回答。通古斯人“在血缘上”首先同尤卡基尔人是亲近的，同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中央亚细亚其他从事游牧的突厥—蒙古语各族，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因此，通古斯语言主要是通过东西伯利亚古代居民的同化而传播的。相反，雅库特人在人类学方面基本上非常接近中央亚细亚各族，同北部的布里亚特人实际上没有区别。所以，

①问题不会由于一个不方便的名词“基础语言”（язвгк—основа）来称呼原始语而改变。

雅库特语是随着人们的大量迁徙而传播的。多数雅库特人的祖先不过千年以前，就住在他们今天的故乡以南很远的地方，很可能在贝加尔湖北部沿岸一带。

2.在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文化中，除中央亚细亚起源的因素居多外，也可以看到同中亚细亚古代从事农业的各族相联系的某些特征。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是不是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古代居民的直接后裔。依据人类学材料，就可以推翻这种假说。无论是哈萨克人还是吉尔吉斯人，在体质类型上同蒙古人、南部阿尔泰人、布里亚特人和图瓦人的关系，比同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先人，要接近得多。这种古代的、在体质类型上属欧洲人种的居民，既没有完全为原于中央亚细亚的突厥语系游牧民所排斥，也没有为他们所消灭。作为对中央亚细亚蒙古人种因素的掺杂成分，这些居民进入了哈萨克人的成分，少数也进入了吉尔吉斯人的成分。蒙古人种因素的渗透至少开始于公元初，可能属于更古老的时期。可是，蒙古人种开始起主要作用比较晚，在公元十世纪以及的头几个世纪，因而是在蒙古征服时代。这种蒙古人种因素的分量在较晚时期的急剧增加，在吉尔吉斯特别明显。有趣的是，在阿尔泰南部，甚至在图瓦，都可以看到类似现象。

由于突厥语在蒙古征服前很久在这些地区就已存在，可以断言，突厥语向叶尼塞以西传播最初与为数不多的迁徙有关，并且伴随着相当一部分当地居民的同化。可是，不能把这种古代的突厥居民看作是哈萨克人，尤其是吉尔吉斯人的主要（在人类学意义上）祖先。

3.人类进入俄罗斯平原北部和西伯利亚西北部低地较晚，不早于中石器时代。这就发生一个问题：居住在这块土

地上的各族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根据人类学材料，这个问题的解决尽管是以极其一般的形式，然而却是完全肯定的。我们所说的从波罗的海到叶尼塞的整个地区，是古代欧洲人种因素和蒙古人种因素杂交地区。蒙古人种的比重由东往西逐渐减少，但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卡累利亚和今天的斯堪的那维亚北部仍然还可以看到。相反，欧洲人种因素的比重由西往东逐渐减少，但一直到叶尼塞仍然还可以看到。因此，这些地区人的移居现有来自欧洲的，也有来自亚洲的，而且混合地区十分广阔。

人类形态学问题

根据人类学这一部门的一般任务，苏联在人类形态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1.从理论上论证体质发展和体质构造的学说；2.制定服装和鞋的标准化的方法。

第一个问题的工作总结，A.И.亚尔霍（1924,1926）、B.Б.布纳克（1931,1937,1940,1940a）及其同事的文章作了阐述。在方法上，苏联研究者工作的特点是放弃指数的运用，这种指数尽管简单明瞭，但所提供的真实数额对比概念有些受到歪曲。实际上，由于一个数额的变化，其余数额的变化是不平衡的。比如，个子高的人的脚比个子矮的人的脚的不仅绝对地，而且相对地要长一些，等等。这个事实早已人所共知，在俄国人类学家的著作中也反复地阐述过。可是，从这些考察中得出方法上的结论只是在苏维埃时代，这时，指数方法在人类形态学著作中已为在退化系数基础上进行数量对比的方法所取代。

П.Н.巴什基罗夫（1937）运用这个方法确认，所谓结构类型的流行观念在统计上并没有得到证实。各种类型的身体比例，无论同脂肪沉着，还是饥肉组织的发展，都没有联

系。但在苏联研究者看来，这后一种特质的变化是独立的。

在身体匀称分类法中，苏联人类学家放弃了瘦长型和矮胖型是基本因素的观念。B. B. 布纳克（1937）取代这种分类法提出了以两种基本的分化类型独立变化为基础的公式，这两种基本类型是：一、纵向型，它表现为足长与身长相适应；二、横向型，它是由与足长和身长相适应的肩宽来确定的。结果，B. B. 布纳克得出了应当成为分类基础的如下公式。

B. B. 布纳克匀称类型分类法（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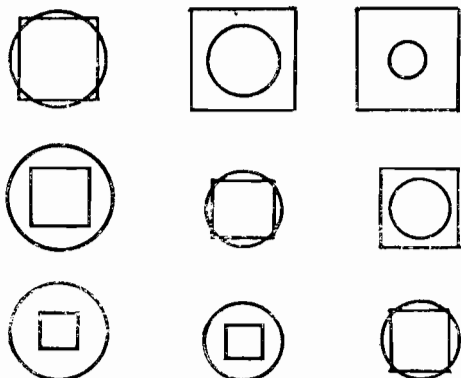
B. B. 布纳克匀称类型分类法（1937）

肩 宽 足 长	窄	中	宽
短	微人型	次胖矮型	胖矮型
中	低协调型	协调型	高协调型
长	瘦高型	次瘦高型	巨人型

从同样的原则出发，也奠定了体质结构类型分类法的基础。以骨肌肉组织和脂肪沉着的独立变体为基础的公式，代替了极为流行的分为虚弱型、强健型和矮胖型的三分法公式。

据我了解，C. Ф. 巴罗诺夫（1930）第一页运用了这个原则，他借助于下面的一种图式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结构类型分类公式，在这个图式上，正方形大小表示骨肌肉组织的发达程度，圆形大小则表示脂肪沉着的发展程度。

С. Ф. 巴罗诺夫结构类型图式 (1930)



B. B. 布纳克 (1931) 也从同样的原则出发, 对结构类型作了说明, 指出了两种独立的变态方向: 一是决定于机体的水媒性程度, 并体现在骨骼和肌肉发展的程度上; 一是决定于碳脂肪代谢的发展, 并体现在脂肪沉着上。

B. B. 布纳克结构类型分类法 (1931)

脂肪沉着 肌肉发展		强	中	弱
		强	过度紧张型	高度紧张肌肉型
中	高度紧张营养型	中度紧张型	低度紧张肌肉型	
弱	不等紧张营养型	低度紧张营养型	不够紧张型	

A. A. 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付博士论文中，对于体质结构观点从理论上提出最详细的论证，这个论文是1935年答辩的，但正式发表却较晚（1948）。根据A. A. 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体质结构有四种基本类型，在下面的表格中，他用黑体字加以表示。但是，A. A. 马林诺夫斯基作为结构类型说明基础的原则，同划分与C. Φ. 巴罗诺夫和B. B. 布纳克类型一致的其他类型并不矛盾。

基本结构类型的相互关系
(A. A. 马林诺夫斯基, 1948)

骨松果体发育	骨营养	优	中	次
	优	正常躯体“运动”型	“运动”型	细软躯体“运动”型
中	正常躯体型	中间型	细软躯体型	
次	正常躯体“大脑”型	“大脑”型	细软躯体“大脑”型	

A. A. 马林诺夫斯基的公式形式上同著名的西戈和马克—奥利夫公式极其相似，但 A. A. 马林诺夫斯基著作的基本内容在于，对说明所考察的现象从理论上采取了另一种态度。

心理特点同体格的联系问题，也是苏联人类学家注意的对象。

Я. Я. 罗金斯基用克列姆仪器对希望成为司机的人们进行试验，在他有关研究这种试验结果的著作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社会生活条件下，能够“准确预测”被试验的人

在相应领域的未来行为的思想完全是虚伪的。自觉对待自己的心理特质，是人类心理同动物心理的重要区别。这种态度不会导致行为生物基础的消失，但它会使这种基础服从于在每一个体中产生创造性原则的新的人类特质，也就是产生“使这一个体的行为无法预言”的东西的特质（罗金斯基，1937，第132页。）

服装标准化方面的研究有了广泛发展，战后年代尤其如此。一切人类学研究的成果，都已运用于轻工业的缝纫、制鞋等部门。

M. B. 伊格纳季耶夫(1951)制定的规定合理“型号”的方法，是这方面最重大的成就。问题是消费者的利益和工业部门的利益有一定的矛盾。消费者自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型号”。然而，增加型号数量会提高生产价格。M. B. 伊格纳季耶夫确认，随着型号的增加，需要这种产品的人们的百分比将不平衡地增长，“型号”增加到超过一定的数量，不会使居民满足的程度有很大增加，因而在实际上是无尽的。在任何情况下，工业方法生产的产品总是不能满足一定数量的人们的需要，他们不得不进行个别的定货。

*

*

*

我们远远不能遍举苏联人类学家过去和现在研究的一切科目和问题。在一篇杂志文章里，也无法指出他们大量的通俗著作。B. H. 维什涅夫斯基(1928, 1934)，M. A. 格列米亚茨基(1925, 1954)，B. C. 茹科夫(1931)和M. Ф. 涅斯图尔赫，过去和现在都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人类学及其成就的宣传员的光荣使命，他们成功地把这种活动同紧张的研究和组织工作结合在一起。M. C. 普列谢茨基(1951, 1951 a, 1956)为科学普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1941年和1955年，发表了人类学教科书（布纳克，涅斯

图尔赫，罗金斯基，1941；罗金斯基，列文，1955）。这些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在“西方世界”的书刊评论者当中引起了明显的不满，其中之一仍然承认罗金斯基和列文的教科书比一切英语教科书都要好。

我们也没有涉及同人类学课题直接有关，而是其他知识领域的专家所撰写的大量著作。在苏联，广泛开展了大脑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与人类学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布林科夫，1955；沙尔基索夫、菲利莫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1949；波里亚科夫，1956）。

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大脑研究实验室，在Ю.Г.舍夫钦科的领导下，使大脑研究在组织上与人类学研究接近起了促进作用。

许多解剖学家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人类学研究。例如：Н.Д.多夫林亚洛（1937）和Н.С.瑟萨卡（在出版中）关于人的颅骨的年龄变异的著作就很有意义。可以表示相信，人类学杂志的重新出版将有助于解剖学家同人类学家更密切的联系，这在发展形态学研究是苏联人类学的头等任务的现阶段尤其是特别迫切的。

参考资料：（134种，略）

翻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汤正方
译自《苏联人类学》杂志1957年第1期

3. 民 族 学

民族学（原于希腊文 $\epsilon\lambda\eta\nu\omicron\varsigma$ ，即部落、人民，和…… $\rho\pi\alpha\phi\epsilon\iota\alpha$ ）是研究民族和其他族类共同体及其族源、习俗、文化历史，关系的社会科学。民族学的基本对象是构成各族面